

走出中環價值 重建世道人心 讓社會科學推動香港社會轉型

ebook.hk01.com/article/9083

特別報道・大學教育

作者：劉彥汶、黃雲娜

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認同，香港面對非常嚴峻的深層結構矛盾，正值非常關鍵的社會轉型時期；然而，對於「何謂深層結構矛盾」，又該「如何推動社會轉型」，大家長久以來卻都缺乏共識，而當中一大癥結在於，社會科學發展遠遠不足以回應香港社會問題。

「社會科學」本是用以描述、解釋和預測社會現象的實證研究，也是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重要工具，更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但在香港，儘管各大高等教育院校均有開設具備一定規模的社會科學課程、定期發表一定數量的社會科學研究，不過整體而言仍然呈現使命價值不清晰、發展戰略不明確、學科體系不健全等問題，以至於社會上下都對社會科學存在一些誤解，例如不少市民將之視為「乞食科目」、教育資源也很有限——只有一成學生修讀社科，《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期刊》也不怎麼研究香港，治港精英更加不會藉着推動社科發展以解答時代命題，包括透析問題本質、化解矛盾根源、提高決策水平、強化治理效能。



香港正值非常關鍵的社會轉型時期，需要專業而深入的社會科學研究回應時代命題。（資料圖片）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人文科學並稱四大科學領域。一般認為，現代社會科學起源於18至19世紀的歐洲，基於自然科學取得細胞學說、能量守恆與轉化定律、生物進化論等三大成就之後促使人們擺脫傳統思維方式，又適逢歐洲啟蒙運動和社會大變革，人們

迫切需要就各種社會問題進行專門研究，因而催生這門由不同學科組成的全新科學研究領域。

廣義而言，社會科學是自然科學的對應物，當中包括人文科學，即所有以人類行為和社會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跨學科科學，用以闡述各種現象及其發展規律；但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具體分類並不一致——例如上世紀三十年代英美學者出版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當中涵蓋心理學、教育學、法律學、政治學、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語言學、犯罪學；而1968年台灣出版的《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除了包括前七項之外，還加入統計學、行政學、人類學、歷史學、國際關係；直到今時今日，各地社會科學學說還發展出新聞學、傳播學、宗教學、軍事學等，而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內地，更把馬克思哲學思想作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指導思想，統稱「哲學社會科學」。

至於香港社會科學的定義和分類，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但也令人眼花繚亂，基本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連學科存在的意義和使命也各有不同。

以政府資助的八大公立院校為例，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最為傳統，設有地理學系、心理學系、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會學系新聞及媒體研究中心，課程「着重社會創新及全球公民意識」；至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除了傳統社科必備科目，還納入建築學及經濟學，「旨在培養年輕人成為志及全球的優質專才」；香港城市大學就把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開設「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當中除了社會學、心理學、國際學、傳播學、公共行政學，還包括中文及歷史、翻譯及語言等學系，「培養文化軟實力」；香港理工大學則把醫療護理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開設「醫療及社會科學院」，當中除了應用社會學系，其他四個學系都與護理相關，其網站稱「以專業為基礎的卓越學術水平為使命」、「積極回應業界需求」。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認為，社會科學所學的是「世道人心」，不論是哪個學科，這都是他們共同研究的目標。（歐嘉樂攝）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接受《香港01》訪問時，以「世道人心」概括他所理解的「社會科學」——「世道」包括人類的文化、制度、風俗、約定俗成的規範等，「人心」則是人類的行為、判斷、情感、想法等；而「世道」影響着「人心」，「人心」又塑造着「世道」，「所以這是一個雙向的關係，我們有不同社科的科目，它們都擁有這個共同的研究目標。」趙志裕解釋，社會科學最基本是關心「世道」、「人心」相互影響，不過不同學科各有不同側重之處，例如政治與行政學系強調政治權力的形成及分布、社會學系關注社會權力的分配對社會不同階層的影響、心理學系則重視社會環境及文化規範對於人類行為、思維及情緒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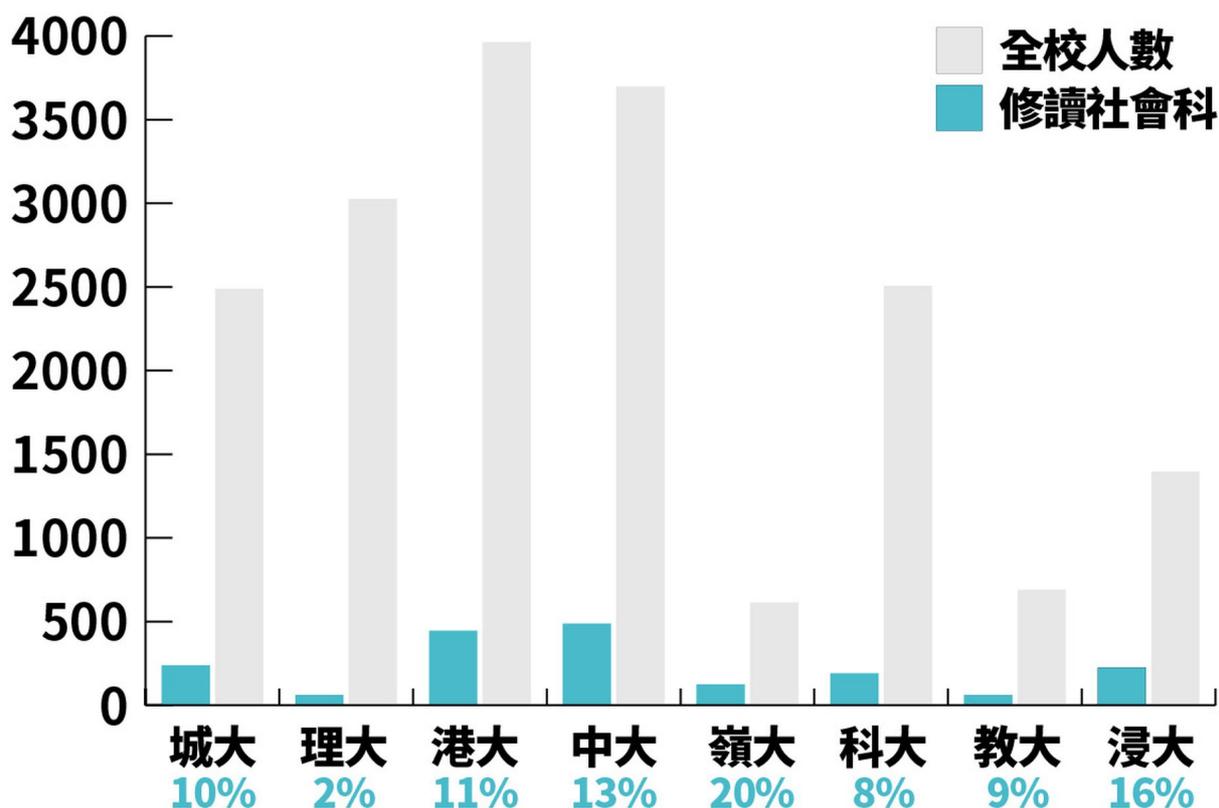
「為什麼要修讀社會科學？如果你問我修讀的動機，我自己作為一位社會心理學家，我相信每一個學生對於他們身邊發生的事物都會感到好奇，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是一個很強的動力。」趙志裕這樣理解社會科學之於學生的意義，「如果你問修讀完社科之後究竟有什麼前景，其實隨着世界潮流的轉變，我們都會期望一個良好的社會科學教育是能夠容許學生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他所說的發展空間，是指學生畢業後可以有不同的選擇——除了繼續深造或跟隨固有就業路徑之外，還可以根據自身興趣選擇投身不同行業，為社會貢獻所長。

經歷政治變局 面對關鍵「雙轉型」

事實上，社會科學的「作用」遠遠大於很多人的認知。它是一個地方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質素、競爭實力的綜合體現，也是人類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重要工具，更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對於歷經極大政治變局的香港而言，當下正值非常關鍵的「雙轉型」時期——其一是意識形態轉型，亟需從西方價值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迷思當中解放出來，推動「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改革和進步；其二是經濟結構轉型，亟需從單一的服務型經濟當中解脫出來，邁向多元的知識型經濟——所以亟待社會科學積極回應前途命題。

世界思潮紛紜激盪，什麼才是香港最該堅守的核心價值？「一國」之下「兩制」天秤重整，在「國家治理」和「港人治港」之間，香港如何跟上「治理現代化」？世界經濟格局進入「新冷戰」，國家經濟發展邁向「雙循環」，灣區經濟競爭出現新形勢，本地經濟前景面臨新常態，香港應該怎樣促進市場的有效運作、推動產業的多元發展、強化分配的公平正義、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質、維護社會的安寧穩定？凡此種種，都需要社會科學的探究和解答。

可是，特區政府似乎不是這樣理解社會科學的存在意義和發展定位。



《香港01》統計教資會2020/21年度八大院校全日制學士課程第一年學生取錄人數，發現入讀社會科學的學生一共有1,836人，是所有入讀八大院校學生人數的10%。（香港01製圖）

首先，如果把社會科學放到「教育」的框架下去檢視其成效，那實在難言有什麼傑出表現。因為作為四大科學領域之一，大學修讀社科專業人數相當有限，例如根據《香港01》統計教資會2020/21年度八大院校全日制學士課程第一年學生取錄人數（見上表），入讀社會科學的學生一共有1,836人，是所有入讀八大院校學生人數的10%；當中，社科學生比例最低的理工大學，只有2%；最高的是嶺南大學，但也不過20%；至於其他院校，則介乎8%至16%。

當然，各大院校收生人數差距除了各自主打專業不一之外，還因為它們對社會科學的科學定義有異。不過，院校對於社會科學的資源投放有限，也是不爭的事實，而這無疑與香港深陷資本主義的扭曲和「中環價值」的壟斷息息相關，往往只以短期的經濟效益作為主要考量，卻不懂得切實因應社會發展需求而重新制定產業規劃，為社科專業學生創造更多好工。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副教授劉國強早於1999年撰寫《論價值教育與香港教育改革——一個建基於哲學與文化的反省》，指出香港教育偏重傳授知識，不是一種求真的價值教育，而是一種追求以知識成為達到其他功用的「用」的價值。他又提到，即使教育統籌委員會曾於1999年1月發表《教育目標》諮詢文件提出，「讓每個學生都在德、智、體、群、美得到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使其一生能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有充分的自信，合群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民主和法治不斷努力，為國家

和世界的未來作出貢獻」，但在諮詢過程當中，「工商界不少人純粹從工商業利益及經濟效益來看教育目標，毫不諱言地以教育就是為了滿足商家或老闆的要求而培養少數合用精英。」

「香港是可惜的，我們（崇尚）所謂『中環價值』，特別是政府，他們批准我們開辦某些學科的時候，會看短期勞工市場，但我覺得這是比較短視的。」作為本科修讀社會科學的教授，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對於政府輕視社科教育的資源分布感到無奈。有別於一些人對社科教育的偏見，他認為學生最重要的是依照個人興趣選擇本科，而不應只考慮職業前途。

博雅專業教育 推動人文社科發展

為了改變香港教育的「中環價值」，何順文在自己任教的院校進行大型改革。八年前出任恒生管理學院校長後，他決心改變外界對這所「商科」院校的刻板印象，致力推行博雅專業教育，大力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如果我們想由一間學院變成院校，是不可能只有商科，一定要有其他學科，不會因為這間學校由商科作主導，就輕視文、社、理等科系。」博雅教育，又稱全人教育，注重解放思想，涵蓋人文社科，並不以培訓就業專才為目標。何順文認為，從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社會需要科技，亦需要理科人才，但從教育的角度，不能如此狹窄，不能夠只開辦理科或商科的課程，「特別是一間私校，公校因受政府資助，政府對他們所開辦的課程有一定的決定權，但我們不需要，所以更加要抗拒這種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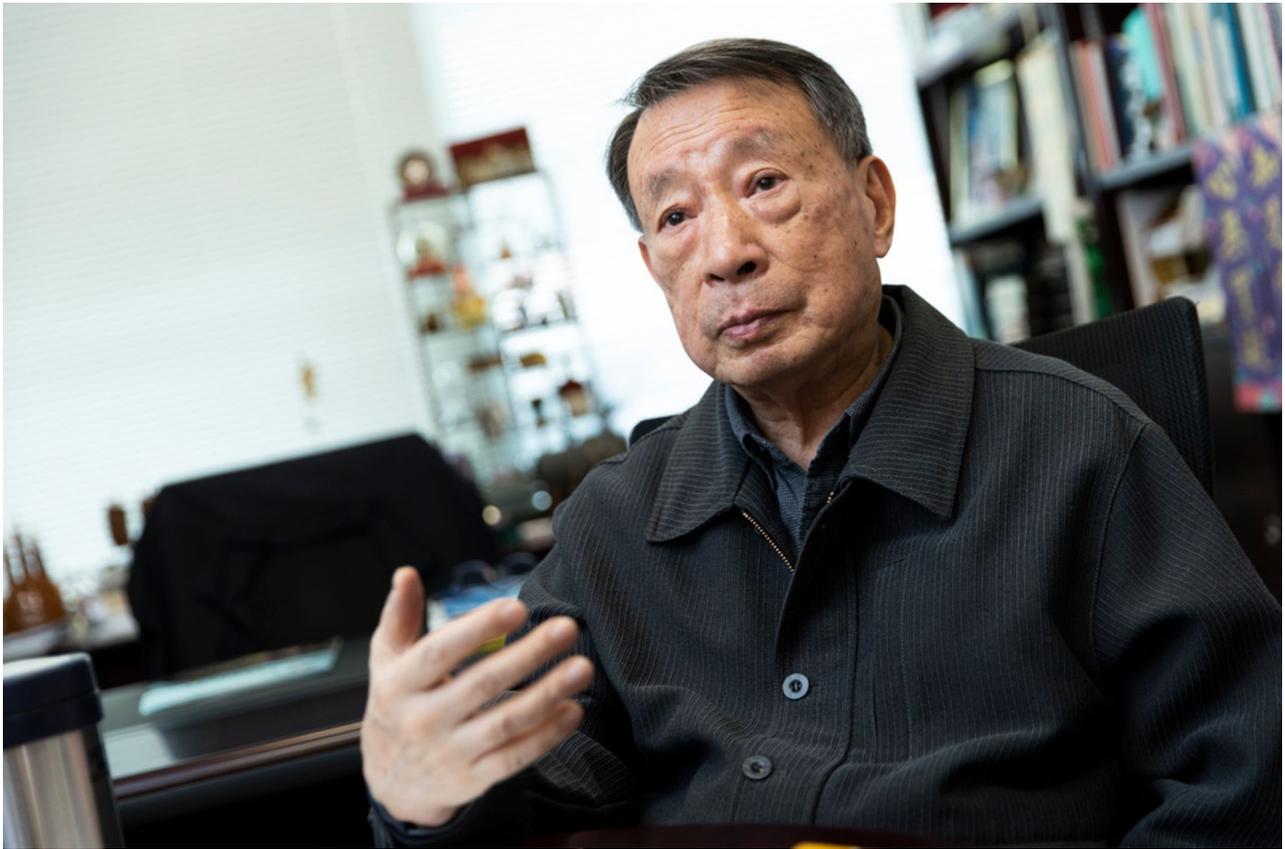
《香港01》整理從1993年至2017年間《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期刊》所刊登的598篇論文主題，發現當中只有96篇文章與香港直接相關。（期刊網站截圖）

其次，如果把社會科學放到「研究」的框架下去審視其發展，那無疑更加令人失望。無可否認，香港各大社科院校的國際排名的確不俗，例如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最新的全球大學社會科學分科排名，香港大學排名第33、理工大學排名第81、中文大學排名第85、城市大學排名第106、科技大學排名第117，可見有關學科在相關領域取得一定成就；然而，若問這些院校實際發布過什麼對解決香港問題存在重大意義的研究，恐怕大多數人都沒有什麼印象，而且在大家的普遍認知當中，甚至會認為香港社科院校鮮少研究香港社會問題。

很多人都不知道，香港有份中文學術期刊《香港社會科學學報》，自1993年創刊，半年出版一次。由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主辦，希望建立一個立足香港、放眼世界的學術交流平台，但至2015年停辦，到2016年夏天起由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繼續營辦。不得不說，早年有些議題確實極具時代意義，例如1993年的《公共援助與「貧窮線」的訂定》、《香港和澳門的非殖民化比較》、《居者有其屋？——香港房屋政策和房屋社會學初探》、《香港貧富差距惡化下的社會保障措施——兼與亞洲各國比較》、《專家霸權與內在權威性——評《香港青少年犯罪問題》》，以及1994年的《退休保障與香港政府財政》、《兩岸三地產業之結構整合及其政策涵義》等。

《香港01》嘗試整理從1993年至2017年間《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期刊》所刊登的598篇論文主題，發現當中只有96篇文章與香港直接相關，其他大多是以中國研究或國際研究作為研究主軸。而且，每期論文數量也有明顯減少趨勢，例如在1993年春季發行的創刊號中，合共有24篇文章；但2022年春季發行的最新一期，卻只有5篇文章，僅1篇論及香港——《港澳青少年大灣區發展意向的主觀因素分析：政治信任與正向心理特質》。

另外，即使近年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漸現，甚至於2014年發生連綿79天的大型佔領行動，以及2019年引爆前所未見的反修例風波，但由2019年秋季打後的期刊當中，並沒有任何直接剖析有關問題的研究文章。值得一提的是，當2010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特首曾蔭權詳細闡述香港五大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後，2011年出版的期刊則有研究香港的階級分析、工運鬥爭、向上流動、標準工時、經濟制度等關鍵議題。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對於缺乏本地社會科學研究的現象感無奈：「但那個『遊戲』就是這樣玩的，做本地研究並沒有前途。」（黃寶瑩攝）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向《香港01》解釋，香港社科研究沒落的原因在於，主導教育資源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於1993年起開始向所有政府資助學院進行「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而評核表現對於院校取得政府研究用途撥款至為關鍵，但本地研究對評核而言「不入流」。

重研究輕教學 成院校遊戲規則？

周永新補充，香港回歸後，學者確實有更多機會發表關於香港的研究，例如1997年至1999年《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期刊》發表香港相關的文章有23篇，明顯比起其他時期所發表與香港相關的文章數量較多。但1997年主權回歸後，中國國力逐漸提高，即使是關於香港社會議題的研究，也難以完全脫離國情，「例如我以前曾撰寫老人議題的研究，也不能只寫關於香港老人，必定要加入中國的元素。」在現實層面，只有這類型具國際視野的文章才能迎合RAE評審的「口味」；而即使中央政策組每年都會撥款予「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提供資金予學者進行本地研究，但吸引力有限，申請人數也寥寥可數。

周永新又稱，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會直接影響他們在院校的升遷。教資會除了RAE之外，亦會向個別優秀學者提供「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學者如要取得GRF，研究必須刊於國際期刊，而GRF的多少會影響其升遷，「（學者）有時候也會與非牟利機構進行一些本地研究，但都要在空餘時間去做。」他對缺乏本地社會科學研究的現象感無奈，「但那個『遊戲』就是這樣玩的，做本地研究並沒有前途。」

除此之外，「盲目追求國際排名」也是院校「不務正業」的關鍵。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前副教授謝永齡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有鑑於論文引用在國際排名公式佔比較重，大學會要求教授多撰寫高質素且高排名的論文，而大學會將這個要求放入聘約，

如果教授文章過少或排名過低，大學可以解約，「有很多（教授）在上班時間有80%放在研究，20%放在教學及行政，這個情況是很普遍的。」謝永齡解釋道，如果教授將大部份時間放於自己的研究之上，跟隨他們工作的研究生或許能受益，但對於不會參與研究的本科生而言，他們根本無法從教授的研究上學習到需要的知識或能力。

香港重商重理重創科 社科畢業生前路茫茫

ebook.hk01.com/article/9084

特別報道・大學教育

作者：劉彥汶

社會科學本是有助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科學領域，但在香港，由於長久以來都被重商文化主導教育價值，加上近年急需追趕創科熱潮，從小學到大學都推廣STEM教育，社科資源相對較少，學生比例也只佔所有高等院校學生人數的一成左右。在產業結構固化的情況下，傳統商科專業和新興創科行業的就業需要仍然比較暢旺，薪酬待遇也相對吃香，但與社科相關的工種卻愈來愈難有出路，畢業起薪更比醫護科系少逾一半。具體而言，社科畢業生面對什麼發展困難？在傳統人力市場上，他們欠缺什麼競爭力？特區政府又可如何重振社科？



資訊科技及工程行業起薪點較許多行業高，社會科學則被視為沒有前途的科目。

隨手在網絡搜索「社會科學」這四個字，映入眼簾的主要搜尋結果是「社會科學前途懶人包」、「社會科學出路」、「讀完社會科學做咩好」——可見有志修讀社會科學的學子，主要關心的仍是就業前景，而這個憂慮早已困擾歷屆社科畢業生多時。普羅大眾對社科專業人士的一種刻板印象是，他們偏重理論訓練，缺乏實際應用技能，相對而言無甚用處。

中國人民銀行官網於2021年4月14日發布《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一文，提到「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而國家未來的創新驅動需要重視理工科教育。文章旋即掀起一場輿論戰，不少網民甚至發表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文

科無用論」。香港沒有參與其中，但特區政府的人才培育政策和教育資源分配，已經足以顯示當局對「文科無用論」的認同。例如，政府為了吸引更多大學畢業生投身創科行業，創新科技署於2020年7月1日宣布將「研究員計劃」及「博士專才庫」整合為「研究人才庫」，以資助每間合資格公司或機構聘用最多四名取得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創科人才進行研發工作，擁有本地大學學士學位的研究人才每月最高津貼額為18,000元、碩士學位的津貼額為每月21,000元、博士學位的津貼額則是每月32,000元。然而，其他學科畢業生沒有如此厚待。

儘管如此，不少學生仍然有志修讀社科。根據各大院校的資訊，中文大學、城市大學及嶺南大學的社會科學系是位列2022/23年度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首輪申請的五大選科之一。可是，各大高等院校提供的社科學位相當有限，根據《香港01》統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2020/21年度八大院校全日制學士課程第一年學生取錄人數（見下表），入讀社會科學的學生一共有1,836人，是所有入讀八大院校學生人數的10%；當中，社科學生比例最低的理工大學，只有2%；最高的是嶺南大學，但也不過20%；至於其他院校，則介乎8%至16%。

各大院校 2020 年 入讀社會科學全日制學士比例

	修讀社會科學	全校人數	比例
城大	239	2489	10%
理大	62	3027	2%
港大	445	3963	11%
中大	488	3698	13%
嶺大	125	614	20%
科大	191	2507	8%
教大	62	690	9%
浸大	224	1396	16%

《香港01》統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2020/21年度八大院校全日制學士課程第一年學生取錄人數，入讀社會科學的學生一共有1,836人，是所有入讀八大院校學生人數的10%。（香港01製圖）

而且，社科畢業生的就業率、薪金長期處於劣勢，也未能得到政府特別扶持。根據教資會2019/20年度數據，八大院校就讀社會科學系的就業率介乎19%至86%，當中最高就業率的課程是港大教育及社會科學學士，因為這是港大教育學院與社會科學院合辦的學科，畢業後便擁有教育文憑資格，所以就業率相當高；最低就業率的課程是港大的社會科學（政治學與法學）學士，因為大部份人選擇繼續升學，只有極少數人會選擇就業；至於其他社科課程的就業率普遍介乎50%至70%之間，相對其他專業學科而言較低。

除此，教資會於2020年1月更新的2017/18學年畢業生薪酬統計顯示，修讀醫科、牙科和護理科的平均年薪最高，達到46.2萬元，其次是教育科畢業生，也有29萬元，但社科畢業生卻只有22.7萬元，只比文科和人文科學畢業生的20.8萬元高出一些。根據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及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2018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薪酬及福利調查報告》，不論學歷高低，資訊科技及工程行業，起薪都較其他行業高。凡此種種數據可見，社會難免有種潛在意識，認為社會科學是「沒有前途」的「乞食科目」。



資深人力顧問、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認為，修讀社會科學的學生前途並不比其他學科遜色。（資料圖片）

醫療藥業及商科人才需求增

資深人力資源顧問、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接受《香港01》查詢時表示，市場數年前已對資訊科技人才有着強烈需求，而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又提升了市民和企業的創科應用，所以當下一些熟悉大數據、人工智能、網絡安全的人才更是炙手可熱，「因為疫情之下要減少接觸，自然會需要消毒等的工作，而這些工作最好不要由人去做，要用機械人做，所以對機械及人工智能的需求又會增加。因此，科技發展的空間很多，（需求）增長的速度很快，所以科技行業這些年都有持續性的發展，修讀這些學科也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

按照周綺萍的分析，市場上對科技人才的需求確實很大，難怪政府及各大院校都會催谷這類人才的培訓。除此之外，周綺萍亦指出醫療藥業及傳統商界行業如銀行、金融、經濟等，同樣是需求較大的行業，言下之意是修讀醫療相關學科及商科的畢業生的就業前景比較光明。

可是，總有人會為了興趣而選擇學科，Jessica（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因興趣而選擇入讀中大社科學院政治及行政學的四年級生。她透露自己在中學時期已經非常關心社會時事，因而立志修讀社會科學，而環顧身邊的同學，大多數人和她一樣，都是為了興趣而投身政政系。

「興趣」和「前途」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矛盾？周綺萍不以為然。在她看來，修讀社會科學的學生前途並不比其他學科遜色，「因為社會科學的科目所學習到的知識覆蓋範圍甚廣，有些會包括心理學、犯罪學、公共管理等。雖然這些知識不是太『商業化』，但也有與『商業』相關，市場上缺失有很多與社會相關的職業。」依她之見，修讀心理學或其他與培訓和輔導相關科目的社科學生，如果有興趣加入商界，可以考慮從事人力資源的工作；至於一些本身已經比較實用的社科學科，例如傳理系、社工系、社會學系等，畢業生更加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因為除了本行之外，還可以從事公關、市場傳播，甚至可以加入政府部門工作。

無可否認，社會科學主要培養的是軟性技能，例如批判思維、好奇心、同理心等，而在旁人眼中，這些幾乎是每一份工作都需要的技能，但受過專業訓練的社科學生未必佔優。從Jessica的經歷來看，香港就業市場未如周綺萍所說般多元化，僱主對社科學生亦不看好。



以前的中大政政畢業生，可謂與政治相關行業的「天之驕子」，但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香港政局劇變，不少人有感政治空間大幅收窄，相關行業前路未明。（中大網頁圖片）

盼增實習機會取得實用技能

踏入大學生涯最後數個月，Jessica正在煩惱未來工作路向。以前的中大政政畢業生，可謂與政治相關行業的「天之驕子」，但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香港政局劇變，不少人有感政治空間大幅收窄，相關行業前路未明。此前，Jessica的家人希望她入職政府做個公務員，而她本人則想成為政治公關，但這兩種選擇都因政治環境生變而告吹，她無法再將興趣轉化成工作，只好改變工作目標，尋求一些商業公關或從事市場推廣的工作。

「但我在找實習的時候，一來有很多職缺已寫明要找商科的學生，二來就算去面試，僱主也會問：市場營銷是什麼？公關是什麼？或者會問（面試者）有沒有學過相關知識，如果沒有學過相關知識，可能會比較難成功受聘。」因為欠缺相關知識，Jessica在面試時只能盡量表現自己的軟性技能，希望僱主看到她的潛力。Jessica相信，不少就讀社科學系的同學都有類似煩惱，未能根據自身興趣選擇未來職業，「有一些（同學）不太知道自己未來可以做什麼，尤其是現在我們這個科目有很多出路都行不通，他們無法做到原先想做的工作。」

然而，外國早已開始反思「輕文」現象。美國商業記者喬治·安德斯（George Anders）曾撰寫《人文學科的逆襲》一書，提及一個媲美eBay及Amazon的網路商店平台Etsy，專門經營線上工藝品市集，支持小企業銷售藝品，產品種類非常多元化。最特別的地方是，所聘請的軟體工程師和數據分析師都有多元背景，例如大學是主修文學史、日本研究、哲學等。其中一名大學主修人類學的員工，受聘後仍然可以善用本科知識協助公司發展，包括利用不同軟件連結全世界各地的藝術創作者及買家，了解他們如何運用Etsy，以及如何改進，使對方滿意。安德斯感慨：「人們很自然就對建造這些工具的軟體工程師奉若神明，可是如果沒有人進行勸誘、交心、說服、辯論、教導、反抗、互動，每一項科技突破都只是個空殼子。」

可是，香港政府及就業市場正正陷入了這個迷思，過分崇拜擁有「專門技能」的人才，忽略了事物的「內涵」。因此，社會確實要改變他們對於理論型學科的固有看法，就讀社會科學系或人文學科的畢業生才有機會，只是Jessica對於政府或社會的改變沒有太大信心，所以她更希望大學能夠向他們提供更多協助。她表示學院現時實習的額度過少，有不少同學也在煩惱實習的問題。她認為大學能夠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讓學生可以盡快適應工作情況，取得更多實用技能，這樣更有助他們在畢業後可投身不同種類的行業。

社科發展也在轉型 改變教學模式 重視理論實踐

ebook.hk01.com/article/9085

特別報道・大學教育

作者：劉彥汶

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科學的變革和思想先導，但隨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來，社會都把焦點放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突破和創新應用上，相對而言忽視社會科學所應發揮的理論思維和解難作用。然而，修讀社科真的毫無用處嗎？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認為社科教育有助培養學生的思維、溝通、判斷能力，促進全人發展；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則認為，社科發展同樣處於轉型時期，需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相信學生會有更廣闊出路。



趙志裕認為，一個良好的社會科學教育，必須能夠容許學生有更多發展空間。（歐嘉樂攝）

「如果你問修讀完社科之後究竟有什麼前景，其實隨着世界潮流的轉變，我們都會期望一個良好的社會科學教育是能夠容許學生有更多的發展空間。」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這樣理解社科教育的意義和價值，但他也坦言，全球都在面對學位通脹的問題，無論大學修讀什麼學科，畢業後都未必能夠找到一份條件可觀的工作。

根據他多年的觀察，有些社科專業較容易讓學生接駁到明確的就業路向，例如中大社會科學院的建築系、心理學系、新聞系、社工系等，工作路徑固定、職業結構清晰。當然，也有一些學科沒有特定路徑，例如社會學、國際研究等，學生難免擔心：讀了有沒有用？

然而，「有用」或「無用」這兩個概念，對任何人而言都是主觀的。有人認為修讀社會科學對於個人或社會「無用」，因為相關專業面對就業困難，本就難以貢獻所長，即使成功找到工作，薪酬待遇和工作內容都未如其他專業理想；尤其是在這個「創科至上」的社會，礙於課程設計未有跟上時代發展，多數社科學生根本無法掌握相應的程式編碼和研發技能，也更難免令他們意志消沉，對修讀社科失去興致。當然，總有人深信修讀社科「有用」，但多數是以個人喜好凌駕就業現實，純粹基於社科價值觀和他們相契合，希望能夠幫助社會。

人才培育政策局限於世俗價值

不同人對「有用」與「無用」的主觀判斷，可以「理性化」作進一步解釋。「理性化」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人類能夠從原始社會過渡至現代社會，是因為人類運用智慧愈來愈得心應手，而這個過渡的過程便是「理性化」的過程。台灣學者林大森的論文《當今大學教師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解析：Weber學派的觀點》提到，理性化有別於傳統社會所信奉的巫術和宗教，其着重點是目的性、邏輯性、系統性、可計算性與可控制性，而這也是現今社會越趨向科學與工業化的原因。當人類做出任何社會行為前，多會對行為的目的與手段作為考量，這也是一種「理性」。韋伯將這種「理性」區分為「工具理性」及「價值理性」，而這兩種概念會協助人們思考什麼是「有用」，什麼是「無用」。

當人們使用「價值理性」時，他們會相信該種行為無條件的價值，強調統正的動機以及選擇正確的手段去實現自己的目標，結果並不是重點，重點是手段能否與他們的價值觀一致。因此，有些人會認為修讀社會科學「有用」，是出自他們與學科的價值觀一致，如修讀政治系是因為學生期望未來能夠從政，希望這個社會能夠成為他們所期望的模樣，所以他們不會去計算修讀學科後能否有高薪厚職、是否有前途無限的工作前景。「工具理性」則相反，他們會以結果作為行為的考量，並以功利動機驅使行為，單純從效益最大化的角度考慮，正如有些人會認為修讀社科「無用」，因為從結果而言他們所得到的客觀利益較少。

可以說，沒有一種學科絕對「有用」或「無用」，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如果社會所重視的是學生能否達成自己的理想，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絕對有其用處，若然社會只重視自身或短期利益，例如經濟價值上的考量或就業市場的人手等，就會被看低一線。儘管以功利定義所學未免過於膚淺，但香港人才培育政策就是如此着重「中環價值」，令學生得不償失。



何順文成為恒生大學校長後，便致力在學校推動文理兼備的博雅專業教育。（歐嘉樂攝）

例如，當局自2015年開始計劃「一條龍」的創科人才培訓，提出於中、小學推動STEM——即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教育的建議和策略。根據2015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文件《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其中一個發展原因是為了保持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認為香港在不同層面上面要具備不同能力的多元人才，以滿足現今世界在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上的需要。無可否認，香港的確需要提早裝備學生，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政府彷彿將香港教育變成了「兵工廠」，學生從小學開始已經以「職業導向」為前提接受教育，將來成為政府所需發展工具的其中一員。

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對於職業導向的教育政策感到不齒。他絕對明白資訊科技發達，而香港亦確實比較缺乏創科人才，所以商界會希望增加商科、創科勞動人口，「但我認為這個問題已受到歷史教訓，每個潮流都會興起某些學科或工種，或許以前這個方式都是可行的，可是，社會已經改變了，不再是單一學科就指向單一工種，會將不同的學科連結起來。」

何順文尤其對STEM的教育感到疑惑，因為中學教育已不再分開文、理、商，而是合為一體，政府卻又要求中、小學生多讀有關於STEM的課程，「我相信中、小學的基礎教學永遠都應該鼓勵平衡、文理兼備，美國的大學很多時都會將文、社、理放在同一個學院中。」他質疑，現時政府對於STEM教育的經費支出，都變成了「交功課」，是因為社會希望推行STEM教育才去推行，卻沒有深思這套發展戰略。當然，中、小學的教育動機應該保持單純，是為了引起他們對不同事物的興趣及思考，而非早早將他們所學與工種及職業掛鉤。

何順文不會對任何學科存有偏見，鼓勵學生依照自己興趣選擇本科，而不應是只為了前途。事實上，有不少學生和家長會希望自己或子女能夠選擇一些貼合市場需求的學科，何順文亦留意到有不少年輕人在選擇本科方面容易受朋輩、家長或前輩影響，他演講時都會提醒學生別受他人或世俗目光影響，而應遵循自己的性格、專長及志趣，「除非你在小時候便有明確的目標知道自己要修讀什麼學科，要不其實沒什麼關係，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興趣。即使修讀完本科，學生希望轉變工種或學科，多修讀一個文憑其實已經可以轉變到。」

社科訓練思維及判斷能力

何順文秉持這種教育理念，八年前出任恒生管理學院校長後致力推行博雅專業教育，大力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本科就是修讀社會科學的他，相信社會科學訓練能夠為學生帶來一定好處，例如社科人通常有較佳的思維、溝通能力、判斷能力，晉升至中高層便會發現並不「蝕底」，「確實，英國有數據證明就讀社會科學比起就讀STEM、工商管理、法律、工程等學科較遲就業，通常會遲兩至三年，薪級點也比起就讀實用學科低，但美國學院及大學協會的研究報告指出，當工作達至收入的高峰期，即大約55歲左右，讀任何學科已無關係，甚至發現有人文學科或社會學科的背景，薪酬比起其他學科高。」

坊間對於社會科學的其中一樣刻板印象，是過於着重理論的學習而輕視實踐。事實上，社科課程也的確要求學生閱讀較多論文、撰寫論文。對此，趙志裕承認這種教學模式或許需要改變：「現時香港的社會科學教育依然是一個轉接期，大家對於社科的理解，在傳統上依然會認為它是文科，如果是文科的話，自然需要學生閱讀更多論文、撰寫文章及考試，然後儲夠學分便可畢業。」他指出，傳統社科教育模式十分重視理論，整個學術領域也是以研究理論為主，因為人們相信理論可以解釋現象，但礙於研究方法所限，所以忽視理論未必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將理論和實踐切割開來。

不過，九十年代後，整個社會科學界都有着翻天覆地的改變，「我們現在說的是數據科學、大數據，我們會以電腦模擬去預測社會變化及人類的行為變化，例如中美貿易戰的結果，我們都能夠以電腦模擬的方式進行預測。」趙志裕說，當研究方法出現轉變的時候，研究的重點都出現了改變，從前學者會研究有什麼理論可以解釋一些社會現象，而現時會研究到底甚麼理論可以解決這社會的問題，可以順利解決問題的理論便是一個成功的社會科學理論，亦即是「solution oriented social science」（解決性社會科學）。



香港正值非常關鍵的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科學的發展同樣如是。（資料圖片）

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出現的研究轉變同時帶動了教學的轉變，當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改變了，必須有機結合，而學院亦需要以另一種方式去進行教學。趙志裕舉例，現時閱讀文章的環節會改為要求學生自己在家中進行，在課堂上便會要求學生將讀來的理論用以實踐，例如他所教授的一門課程「Managing Creativity and Group Dynamics in Innovation Teams」（管理創新團隊的創意及團隊動力）便會在課堂上要求學生設計一些創新產品，將論文中理論放到實踐之上，功課亦由傳統的學期論文改為設計產品樣本。

不過，趙志裕也坦言，社會科學發展同樣處於轉型時期，「大學聘請教授時只要一上任便可留任三十多年，所以大學發展『新陳代謝』的過程還是很漫長。有些（教授）會比較傳統，有一些會比較新派，學生需要自行選擇。」他又認為，學生剛從中學升到大學，教學模式如果與他們在中學的教育過於不一時，他們可能難以接受，也需要時間適應，所以不論是教授還是學生，都處於一個轉折期，過程並不容易。

「有關於課程上實踐與理論的教學比例，如果是一些教得較為靈活的教師是不存在分野的。」話雖如此，但趙志裕坦言香港的社會科學教育改革比起美國及新加坡的進展是比較緩慢，他在美國及新加坡工作過一段時間，發現新加坡有很多教師都已是用到新派的教學模式，重視學生學以致用。相反，他在香港兩所大學任教的經驗來看，還是有不少「癡心」於傳統教學模式的教授，但隨着更多年輕教學人員的加入，他相信氣氛會慢慢改變，只是需要更多的時間。

雖然教育不應與市場需求掛鉤，但確實有學生希望可在本科畢業後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因此，趙志裕為了增加社會科學系畢業生的競爭力，他亦依照市場所需要的人才設計了一些綜合學科的課程供學生選擇，「我們觀察到很多科研發展機構會聘請很多人才，推動未來以科技為主的工業，如果看看微軟公司的招聘廣告，他們需要多元化的人才及不

同群體的工作經驗。」他認為學生不只需要在大學讀書的經驗，還需要實際在企業上工作的經驗，所以他指出一些良好的社會科學學位都會盡量安排學生進行交流，或給予他們進行實習的機會。

除此之外，趙志裕亦介紹到中大社會科學院一個獨特的副修課程，學生如報讀了這個課程，便會在第一年修讀設計思維及管理創新團隊，並思考一個他們想去解決的社會問題，然後他們需要在往後三年內選修任何一科可以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的學科，最後會完成一個「度身訂造」的計劃，以解決他們在一年級想到的社會問題。趙志裕稱，這些學生並非「單打獨鬥」，他們會與不同學科的學生共同想出解決方法，又會邀請相關的業界人士成為學生的導師，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學生在畢業後便可與他們有興趣加入的公司，或升學時的研究院提出這個經驗，令他們在就業市場上較有競爭力。

「現時已經不再是上課看完一疊論文，考個試，儲夠學分就畢業的學習模式，因為大多數的社科課程都能夠給予你這種體驗，問題就在於我們如何能夠讓學生在四年內擁有一些體驗，並將其變成學生將來可用作貢獻社會的知識。社會科學就是用來改善社會和解答社會問題。」趙志裕重申。